世界经济

美国主导TPP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 霍建国

TPP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增长活跃的亚太地区就形成了有21个经济体参加的APEC合作机制，21个经济体领导人签署的茂物宣言其目的就是在亚太范围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鉴于在APEC范围内既存在发达国家，又存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货物贸易零关税的目标上很难达成一致。曾经提出的平衡方案是发达国家用十年时间完成自由化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二十年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在推动过程中由于矛盾突出，难以协调，其间曾尝试过采取部分国家自愿实现自由化的进程，但仍难以奏效。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茂物目标的努力。其间，中国曾联合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极力倡议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并受到了大多数经济体的响应和支持。

在APEC范围内推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失败之后，2002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联手继续推动零关税目标，并组成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是TPP的前身。

时至2008年，美国经济日益困难，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不仅大大消耗了美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也重创了美国在全球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面对东南亚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更加重视参与亚太的发展进程，并寻求扩大其在亚太的影响力。所以同年11月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并按美国的标准全力推动TPP谈判进程。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谈判进入快车道，在随后的五年中谈判成员陆续扩大到12个。TPP共进行了19轮谈判和多次部长级会议，均难以突破，随着奥巴马的任期即将结束，美国不断加大力度，同时在策略上也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终于在今年10月5日完成了谈判。

主要特征

TPP代表了发达国家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货物贸易的零关税要求；服务贸易领域准入前国民待遇要求，即对所有服务部门均应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当然对国防，金融，航空等个别领域仍保留了一些例外。在金融服务和投资领域均要求按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此外在TPP的条款里除了WTO原有的谈判内容外，还增加了四大类横向的议题，即包括规则的一致性、公平竞争营商便利化、中小企业问题及发展议题等。

TPP更加关注各国边境后的制度安排。TPP被美国称为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为全球贸易树立新标准并集中代表了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议题，其显著特征就是对边境后规则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更多涉及一国的国内法律法规条款或公平竞争的有关条款。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中性竞争政策方面以及劳工标准和环境规则方面都体现了更严格的新要求，而这些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严重的认识上的差异。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规则的实行意味着一国主权的出让，更现实的问题是制定规则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些规则是否可以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并能付诸实施仍需要多边场合深入探讨并取得共识。

TPP成员内部落差很大。在TPP12个成员中既有大国也有小国，有最发达的美国，也有低收入国家的越南，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又同时是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属于双跨队员。尽管其内部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四分之一，但据测算自贸区成立后其贸易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内部制度的一体化难度更大。

影响及发展前景

TPP对我国贸易实务量影响有限，TPP启动后，区内贸易会更加便捷通畅，有利于提高贸易的效率并降低成本，但对中国来讲影响有限。主要是因为TPP协议中主要贸易大国都同中国保持着相当规模的贸易额，相互的依赖性较强，加之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潜力巨大，主要国家仍会扩大对我国的出口。此外，在目前12个TPP成员中已有6个同中国签署了自贸协定，双边贸易渠道畅通，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继续扩大市场开放，贸易投资机会将不会受到影响。

TPP所形成的高标准对全球贸易体系有一定影响作用。尽管TPP目前仍是一个区域自贸协定，其所形成的高标准短期内难以转化为多边体制统一的标准，但不排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会联手力推TPP的高标准，并逐步通过WTO将其纳入多边体制，即使WTO不会全部接受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但亦不排除部分或有选择的采纳吸收，届时将对发展中国家形成较大压力。

TPP将通过吸收新成员不断扩大其影响。目前TPP成员虽仅12个，但其仍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特别是针对东盟自贸区成员，美国将不断地说服有关国家加入TPP协议，以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达到抑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下一步有可能参加的是印尼、菲律宾、韩国等。

美国主导的TPP协议有多重目的。一方面，可以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支点，通过扩大同亚太新兴经济体合作拓展其贸易和投资规模，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经济，美国担心中国将形成在亚太的影响力和主导力，美国要以TPP为抓手，重新主导国际贸易标准，这在客观上会对中国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

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应保持政策定力，从容应对TPP。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完成了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各行业各部门正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有计划地在推进各项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应该受到TPP的干扰，更何况TPP签约到实施至少还需要一年左右时间，而根据有关方面测算，其实施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TPP的签约看得过重，似乎中国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对中国而言，TPP的影响大小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工作是否得当，只要我们能确保经济稳定的增长，坚持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新的增长动能，更快地推进对外开放，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加快进度，力争做到以改革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缓解来自TPP的压力。“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构建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树立我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包容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理念。“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有助于我们缓解来自TPP的压力，并可以树立我国良好形象和影响力。

加快突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事关重大，对稳定东北亚局势，带动各自经济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可以促进中国加快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实现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思路。加快中日韩合作一旦取得实质进展，即可以有效缓解TPP可能带来的实质影响。

积极主动推动RCEP谈判，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进程十分必要。中国可以率先通过对东盟的扩大开放不断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各项安排，有利于促进国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同时通过加快RCEP谈判尽快形成区域经济贸易伙伴关系，亦可以有效缓解TPP带来的影响。RCEP谈判同样将形成众多适合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发展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可以转化为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TPP的规则和RCEP规则最终将供国际多边体制采纳。

继续推动FTAAP的进程。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方已经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倡议，并得到了领导人的通过，责成先进行可行性研究。从目前亚太的经济贸易格局看，RCEP和TPP将可能长期并存。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在亚太未来发展方向上，中方仍需要同美方加强沟通，最好形成中美共同推动FTAAP的局面，这将有利于在亚太地区形成联合统一战线，有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为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发展时机。

英国卡梅伦政府对外政策与中英关系发展

卡梅伦政府发展对华关系表现出的强烈竞争意识，也推动了英、法、德等欧盟大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的良性竞争，高层互访不断，深度合作呈现轮动态势。

□ 王展鹏

与上届联合政府相比，英国保守党政府对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在自身国际地位定位、与世界主要力量间的互动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而日益迈向“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无疑是英国外交的一大亮点。

追求大国地位的态势并未根本改变

近年来，英国外交表现出的一些“内倾”特征引发了关于英国对外政策是否放弃大国雄心、走向孤立主义的争论。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英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冲击，同时受到国际力量东移、美国重返亚洲等因素叠加的影响及英国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卡梅伦政府为使英国尽快走出战后最长的经济衰退与低速增长期，也出于2015年大选“拼经济”的考虑，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降低，对外干预的冲动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英国审时度势，硬实力和软实力并用，追求大国地位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15年1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英国普通民众和意见领袖认为“英国应保持大国雄心”的比例高达63%和61%，达到2010年启动该项研究以来的最高值。保守党新政府执政后，卡梅伦也多次批驳“英国出现战略收缩”的说法。此外，2013年以来英国经济复苏强劲、领跑主要发达国家，也给英国对外政策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调整对外政策战略重点和优先顺序

保守党新政府执政以来，英国对外政策的讨论和政策实践表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从整体上看，英国外交服务国内经济、政治议程需要的特点更加突出，对外政策的务实性、多元化和灵活性进一步加强，但同时在英国外交政策重点和优先顺序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争论。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兼任首席大臣，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发言权上升，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保持经济强劲复苏，重振英国经济仍是其压倒一切的任务。2010年后联合政府在重视英美、英欧关系的同时，开始淡化布莱尔时期充当“欧美之间桥梁”的定位，提出充当“全球性枢纽”的想法，以期“努力适应日趋网络化的世界，发挥全球影响”，与世界主要力量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目前，在2015年大选中得益于英国经济复苏的保守党政府更加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对英国带来的机遇，发挥其传统贸易国和市场开放度高的优势，在与中国、印度等国发展关系中走到了西方国家的前列。

与此同时，英国传统对外战略支点英美、英欧关系一方面在战略和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呈现出增加态势，另一方面“特殊关系”的特殊性有所减弱，二者间表现出一定的背离倾向。保守党新政府执政后，英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挑战继续发酵，乌克兰危机加剧、“伊斯兰国”崛起，英国内部出现了检讨对美关系、重拾英美特殊关系的呼声，即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扭转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与德、法等欧洲盟国接近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英国在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关系、全球和地区秩序变革问题上，对与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对话、建构共识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英国违背美国的意愿带头加入亚投行便是一例。

英欧关系无疑是英国本届政府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中最富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自2013年初卡梅伦发表布卢姆堡演讲，设定“退欧公决”时间表后，英国政府在对欧关系上的不妥协立场加大了其在欧盟内部受到孤立的风险，降低了影响一体化发展进程的能力。保守党政府希望通过谈判使欧盟做出必要改革，在此基础上，以全民公决方式决定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地位。虽然2015年以来英国反对退欧的民众数量有所回升，但希腊债务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加剧都增加了公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英国政治精英和民众能否在国家主权、利益与建设性参与欧洲事务之间实现平衡，是英欧关系发展的关键。

2015年10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撰文提出，当前英国应该重新界定丘吉尔三环外交的内涵：三环外交的内环、中环和外环分别为英欧关系、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与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更广义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网络。他认为，考虑到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缘政治的挑战，英国在国际力量网络化时代担当中心枢纽的角色已力不从心，加强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是明智的选择。他特别提出，如果英国的决策者意识不到英国的大国地位与英欧关系的成败息息相关，英国的衰落将是结构性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英国战略界关于英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和优先顺序的争论。

明确对华关系在其对外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2015年以来，中英关系出现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国事访问提升了双边关系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是我国运筹大国关系和外交全局的成功实践。英国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关系在其对外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卡梅伦首相和奥斯本财政大臣多次提出，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好伙伴”。英国政治精英和民众都认识到，对英国维持全球大国地位而言，除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欧盟等身份外，英国更为重要的力量资源和优势在于其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地位、伦敦与纽约并称世界两大金融中心以及世界首屈一指的服务业的出口。而中英在金融、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惠合作为推动中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动力。

在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开启之际，中英双方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英关系的这一新定位首先表现为，中英双边关系的战略性、开放性、持久性不断增强，双方更加关注对方的核心利益，高层互访和多领域、高层次的对话机制日趋完善。其次，中英利益共同体建设和人文交流的深入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在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机场、高铁、核电、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众多突破；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英国北方经济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等计划对接的合作前景巨大；而人文交流在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的人文基础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再次，中英关系的深入发展，有利于作为欧盟大国的英国在推进欧盟市场开放、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等议题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卡梅伦政府发展对华关系表现出的强烈的竞争意识，也推动了英、法、德等欧盟大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的良性竞争，高层互访不断，深度合作呈现轮动态势。最后，中英关系的新发展和新定位表现出重要的全球意义，对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全球治理议程的合作有着积极影响，也在国际产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乃至更广义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产生了示范效应。

环球视野

热点透析

反思巴黎暴恐事件



□ 陈积敏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多处发生暴力恐怖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从形式上来看，这次暴恐事件呈现出多点集中爆发、行为极端血腥（很多媒体使用了“屠杀”“血洗”等词）、袭击目标选择随机性（巴黎音乐厅等场所的选择具有随机性）与针对性（法兰西体育场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目标指向性，即针对法国总统奥朗德）并存等特点。这次暴力恐怖事件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引发了社会恐慌与大众焦虑，以至于法国采取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闭边境等最为严厉的应对措施。法国总统奥朗德更是表示这次袭击是一种战争行为，宣称法国“将不会对野蛮的伊斯兰国组织仁慈”，法国“将会在国内或国外等任何地点采取所有手段展开行动”。然而，国际社会除了谴责恐怖主义行为、对遇难者表示慰问之外，对于这次暴力恐怖袭击的后续及外溢效应需做出更多思考。

暴恐事件频发暴露出法国反恐政策与应对机制的诸多缺陷。自2015年以来，法国就遭遇了多起暴力袭击事件，如1月份的《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事件，这足以引起法国政府的高度警惕，并保持情报、安全等部门间的密切合作，加强对可疑人员的调查以及危险品的管控。显然，这次暴恐事件是一次有预谋、有策划、有组织的袭击行为，而诸如此类的大规模暴恐事件最终付诸实施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这为政府早期预防提供了关键时间窗口。特别是，不久前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俄罗斯客机空难事件，已经表露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对西方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的端倪。然而在此背景下，巴黎暴恐事件仍然发生，法国政府必须对其反恐政策与安全政策加以认真反思与检讨。

欧洲移民政策恐将调整，排外情绪与种族主义有可能进一步蔓延。目前，欧洲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这场难民危机不仅是对欧洲所奉行的道德主义与人道主义理念的一次考验，而且也是欧盟所面临的一场重大政治挑战。在应对难民危机过程中，欧盟内部成员国产生了较大分歧。作为推动欧盟发展的重要引擎，法德两国在接受难民问题上率先做出承诺，并冀望其他欧盟国家效仿，积极主动地接受主要来自于中东北非的大量难民，从而缓解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压力。然而，巴黎恐怖袭击令欧洲国家再次陷入到安全考量与人道主义的两难困境之中，这势必给当前欧洲国家的难民政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特别是，这次恐怖袭击将会给欧洲内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如法国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获取更大的政治话语权，这可能会对欧洲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排外情绪与种族主义思潮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实际上，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位于巴黎附近的加莱难民营就发生了火灾，该难民营有6000名来自非洲和叙利亚的青壮年难民。

西方式民主推广战略已成为催生与激化暴力极端主义势力的重要因素。本次暴恐袭击的罪魁祸首再次指向“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回溯这一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拉克等地所实行的政权更迭政策成为该组织壮大的重要外部因素。他们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将该地区的强人政权一个个掀翻在地，试图将西方式民主强制性移植到中东北非地区，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样便能实现该地区的民主与和平，便能从根本上拔除恐怖主义毒瘤。但事实证明，所谓的“大中东计划”“阿拉伯之春”运动给本地区带来的是持续的动荡以及不断扩散的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消灭”一个对手的同时，又为自己增添了一个更加危险且更加难以应对的“敌人”。这不仅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对整个国际社会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所谓的“道德正义”“民主和平”等话语强权绑架了国际社会的民意，从而为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披上了合法化外衣。这种“西方消费，全球买单”的做法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应当反躬自省，通过强制力推广西方式民主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国际政治中，大国自以为是的对外战略不仅会祸及自身，也会殃及全球，故大国在制定与实施对外战略时理应慎重为先，这对于美国而言尤为如此。

打击恐怖主义应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这说明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各国拥有共同利益，也突出体现了构建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巴黎暴恐事件发生后，世界主要大国迅速作出反应，强烈谴责这一反人类的极端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一袭击不仅是针对巴黎，不仅是针对巴黎人民，也是对整个人类以及我们所共享的普世价值的攻击”。美国将会尽一切可能帮助法国，并发誓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法国及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这反映出各国已经意识到在面对恐怖主义挑战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同时也说明对于这一全球性问题，仅凭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显然，恐怖主义已经对国际社会构成了最现实、最紧迫的安全挑战，各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在恐怖主义标准界定、反恐政策协调、情报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此外，在应对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势力的过程中，军事手段的运用虽是必须，但远未充分。根除滋生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土壤才是治本之策，而消除贫困、实现全球均衡发展、加强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包容性、尊重各国人民的道路选择权利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政策选项。